

中文版序

我很高興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的中文版現在可以讓大中華地區更多的讀者讀到。這本書提煉了我三十多年來關於毛時代中國社會的研究和教學成果。中國近現代革命是現代史上最為重要的社會革命之一，而由毛澤東擔任領導人的這一歷史時期，構成了這一系列社會革命的最終階段，並在許多意義上都可以說是達到了激進的高潮。這段時期不僅僅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至關重要，並且對於整個世界歷史來說都意味着一次重大的發展。

1980年代初我剛剛開始教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時，我的課堂上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美國人。幾十年之後，我的課堂上滿是渴望獲取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知識的中國學生。他們常常告訴我中國高中的歷史教科書是怎樣輕描淡寫地略過了這一歷史階段，而本該詳細探討這一歷史時期的相關課程在大學課程體系中也是缺位的。我的這些學生能夠清楚地感覺到毛時代發生了對於中國歷史來說至關重要的大事，並且急切地渴求更加詳細和深入地了解這段歷史。

這本書並不是對於歷史的簡單敘述，也不是對於毛澤東本人的詳細研究，儘管它的確採取了敘事的形式，並不可避免地將毛澤東放置在敘述的中心。這是因為毛澤東在這一整個歷史階段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於如果我們將他的動機和行動從敘述中抹除，講清楚這些歷史事件的模式將會變得非常困難。從根本上說，這本書是一項社會學分

析，考察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新建立起來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及這些結構如何制約、擴大和改變了毛澤東所推行的諸多舉措。本書的核心議題，是毛澤東發動的包括百花運動、大躍進以及文革運動的各個階段的結果都與他本人原初的預期不同，這一落差迫使他不得不經常性地對他的方針與路線做出調整。本書的潛在議題，則在於毛澤東作為一位強有力的政治領袖，是如何帶領着他的政黨在1949年取得了非凡的勝利，卻又隨後在1950年代在新的社會結構面前遭遇種種制約與挫折。

本書分析的核心，是毛澤東與1950年代直接從蘇聯全盤複製過來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持續鬥爭。與其他20世紀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截然不同的，毛澤東向這些國家建立新形式的官僚主義統治與不平等的普遍趨勢提出了挑戰。他在1960年代中期決定發動一場對抗這種官僚主義統治結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這在整個現代社會主義發展歷史上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膽激進的舉措。按照毛澤東自己的標準，並且他自己也承認，文化大革命最終沒有能夠達到他預設的目標，卻給他的繼承者們留下了如何將蘇聯模式的普遍性與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需求相協調的難題。最終，毛澤東的繼任者們領導着中國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本書的讀者將會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這一轉折對於中國以及中國人民來說是多麼地幸運。他們也可能會意識到，在某些方面，中國依舊在持續解決着1950年代蘇聯體制所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前25年充滿了動盪和災難，這一政權展現出極端的施政風格，造就了獨特的革命階段。這段時期無疑被打上了毛澤東的烙印，縱觀世界近代史，毛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時代，力度不亞於任何其他領袖。以毛澤東為絕對核心的領導集體做出各類決策，可結果卻往往適得其反，給民眾帶來災難性創傷。隨着新的史料被不斷挖掘出來，一系列新的研究著作近來相繼出版，釐清了中共高層領導人在這一過程中變化的人際關係和激烈的政治分歧。本書將借鑒這些研究成果，但更關注這些領導人在此之前做出的一系列決策，而這些決策在毛澤東時代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思。同時，以此建立起的組織體系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用來強化管理紀律和確保政令實施的工具，成為紅色新中國的核心特徵。

有兩大組織架構至關重要：其一是共產黨組織體系，嚴格約束着廣大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其二是從蘇聯借鑒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給許多複製該模式的國家造成了一系列問題。中國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從北京發出指令，這些指令通過政治和經濟兩大架構傳至地方各級，雖然達成了最初預想的偉大成就，卻也導致了意料之外的災難後果。撰寫此書時，我始終將這一信念牢記在心：必須先了解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環境和政治體系在1950年代的變化趨勢，這樣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共高層尤其是毛澤東本人的決策制定和施政成果。而這些客觀

的組織架構其實並不利於落實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政策設計，甚至常常引起戲劇性的動盪和災難性的後果。雖然本書大部分內容都以敘事文本的形式展開，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以社會學的視角思考問題。

這一時期的社會環境與經濟體制造就了獨特的政治體系，依靠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嶄新的社會結構，中央決策得以實施。然而，高層政令在傳達的過程中往往不是被誤解歪曲就是被過度解讀，結局總是出乎領導人的預料。權力的集中和嚴格的紀律賦予了中共看似強大的力量，但也埋下了弱點和隱患。對毛澤東本人及其支持者來說，幾乎所有舉措都沒有按照預期的路線發展，結局常常出人意料，後果令人難以接受。可以說，毛澤東的大部分舉措最終都適得其反：其原因究竟在哪裏？

中國的社會特徵與西方世界有着天壤之別，實際上，到共產主義統治的前十年結束時，中國社會與過去相比較也已經全然不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若想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如此狂熱地投身到這個時代的運動和衝突之中，我們就必須首先了解包括領導幹部和普通民眾在內所有人工作和生活的社會和組織背景。這一點對於今天來說特別重要：中國生機勃勃的市場經濟已逐漸融入全球資本主義之中，當時的社會特徵現在幾乎已經難覓蹤跡。在本書中，我希望能闡明以下觀點：在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實際上是社會制度的外化表達，這些制度成型於中共建立統治後的第一個十年，是講述毛澤東時代故事的核心線索。

1973年，當我作為一名本科大三的學生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上第一節當代中國的課時，這本書的主題仍然非常模糊，只是關於一個封閉孤立政權內一系列事件的臆想。1983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第一次教這門課的時候，我稱之為「後革命時代的中國社會」(post-revolution Chinese society)，講述1949年共產黨奪得政權、建立新中國後所創造的新社會。在後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那個時代的大部分經濟與社會痕跡已經在市場改革的浪潮下消失殆盡，但政治架構基本得以保存。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溯歷史，有一點非常清楚，1949年其實不是中國革命的結束，而是社會變革的真正開端，之前的游擊戰爭和國共內戰僅僅是樂曲的前奏。

本書描述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內容凝聚了我三十多年來研究的成果和教學的心得。我有選擇性的敘事手法講述了這一時期的歷史，作為社會學家，我也深切關注政治和經濟因素——尤其是政治權威的基礎、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社會的不平等、政治衝突和民眾的抗議運動。當然，還有其他關於毛時代的中國的敘述方式也令人信服，但不是我在本書中所要採用的寫作方式。

我過去有關中國的研究，針對的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術界讀者。這些著述基於對其他研究的批判性解讀，強調作者的概念性框架、新穎原始的資料來源及分析模式。遺憾的是，這種風格對於學術圈之外的人來說閱讀起來非常枯燥晦澀。而這本極大地借鑒了我自己的研究和多年來所閱讀到的優秀同行們的著作，而並不主要旨在面向專家。我試圖整合自己對中國這一歷史階段的了解，以一種既能適合學術圈交流、也能讓普通人讀懂的方式去寫作。

在學術上和在制度上都受益良多。在學術上的受益不勝枚舉，特別是在我自己研究領域之外的主題，需要大量借鑒和援引同儕們的研究和著述。在引用時我盡可能清楚地注明來源，對同一作者引用次數越多，就表明這些作品對我的啟發越大。我在這裏要尤其感謝白思鼎(Thomas Bernstein)、戴慕珍(Jean Oi)、Dwight Perkins和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他們對本書的全部或部分草稿給出了寶貴意見。我還要感謝我的合作者和合著者——南京大學歷史系的董國強教授。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幾章裏，我引用了我們合作發表的研究成果。本書遞交出版前，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圖書館的Nancy Hearst幫我審訂了最終的書稿。在過去的近20年時光裏，斯坦福大學為我提供了理想的知識家園。我特別感謝斯坦福大學Freeman-Spogli國際研究所、人文科學學院和Shorenstein亞太研究中心慷慨的研究經費支持。在研究和寫作的最後階段，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為我提供了舒適的環境，讓我完成了本書大部分章節的起草。我還要感謝我在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Michael Aronson，這本書和我其他的項目非常不同，我要感謝他對這個項目的支持和鼓勵。

本書的出版標誌着一段旅程的結束，這一漫長的旅途起始於1973年9月，在巴爾的摩的一間教室裏，我的本科導師Richard M. Pfeffer 講授的課程名為「中國政府與政治」。Richard是一位堅定的反戰積極分子和中國問題專家，曾作為首批美國代表團成員訪問中國。他對聲勢浩大的文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他也深刻了解在一個紀律嚴明的革命組織中權力的濫用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社會主義的官僚獨裁體系存在難以根除的問題。同時，Richard也是一個充滿激情又要求嚴格的老師，他孜孜不倦地要求學生去批判地審視包括自身觀點在內的所有論述，對學生的論文展示出無微不至的細心，會在每頁空白處寫上大量的批註，其中不乏犀利的評論，無情地指出偷懶糊弄或是邏輯錯誤的地方。他也是一位給予學生支持和精神滋養的導師，特別是當你開始走上研究正軌的時候。在此之前，我的本科課程顯得很乏味；在那之後，一切突然開始變得清晰明朗。Richard的教學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他的開蒙之恩，我永遠無法奢望去回報。謹以此書獻給Richard，深表懷念之情。